



李达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及其重要意义

赵士发 葛彬超

摘 要: 李达在反思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过程中,对其中的革命与建设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一是从世界历史进程出发,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科学解答;二是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独特性进行了多层面的深入分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构建提供了重要资源。这个过程体现出李达宏伟深邃的世界历史眼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与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这些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李达;世界历史;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世界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虽然俄国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桥梁,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都是从日俄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结合中国实践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李达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他始终坚持将理论和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李达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反思,体现了其宏伟深邃的世界历史眼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与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本文拟结合对李达主要著译文本的解读,考察李达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及其重要意义。

一、从世界历史到中国社会: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科学解答

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題,而且也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问题。作为中国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联系当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客观处境,注重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习和译介。他通过唯物史观把握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自觉地站在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人类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出发去反思“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间,李达格外重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列宁阶段,并从俄国经验与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命运的思考中获得启示,进而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是当时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但没有世界历史眼光是难以看清这一问题的。与当时中国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李达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上也历经了从自发的爱国主义到自觉确立“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发展阶段,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才自觉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后考入京师优级师范,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辛亥革命后,受孙

中山先生的影响,李达的思想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并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两次东渡日本。在国外,李达虽然受尽欺凌却仍刻苦攻读,但他的“实业救国”理想终因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而破灭了。那时李达在思想上是极度苦闷的,他感到“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①。由于当时人们还缺乏科学世界观与历史观的指导,对世界历史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不甚了解,思想还停留于自发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阶段,因而很难认清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未来发展方向。

“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让苦苦探索中国出路的有识之士们看到了马列主义的曙光。随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实践上取得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李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们竞相学习的对象,经过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研究,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并自觉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问题联系起来。马列主义为李达等有识之士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和思维方法,使他们在世界观上迅速转变,眼界不再局限于自发的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从世界历史眼光出发,关注和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将中国问题与世界局势、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李达“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②。他不仅及时地翻译了系统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社会问题总览》与《唯物史观解说》),而且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和第四国际的关系、劳动与妇女的解放、社会革命等世界历史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看法。不仅如此,李达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关系的问题,这意味着李达已经在理论上自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这篇论文中,李达从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出发,精辟地分析、阐述了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任务与策略等问题,科学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时,李达主要根据《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原著,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结合国际形势的时代特点与中国社会的独特国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原理的正确性,同时抓住了一些国家革命失败的问题症结,即在于“旧社会中生产力究竟有无发展余地,难得确定”^③。通过李达在文中对托洛斯基与列宁有关思想的评述,我们不难发现,他已经把握到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精髓。李达非常重视俄国经验与列宁的理论,认为革命的时机要根据国际形势、无产阶级的组织情况与决战勇气来共同判定。他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科学地把握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情况,指出无产阶级受到有产阶级、封建阶级与帝国主义三重压迫。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至于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④在此基础上,他肯定了中国国民党联合国民党推翻军阀统治的合理性,并就此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最后,李达参照列宁对俄国经济进化道路的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后应当走的经济道路与应采取的主要政策大纲,并指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⑤实际上,李达在此已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要将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起来。

①《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2页。

②《李达文集》第4卷,第733~734页。

③《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

④《李达文集》第1卷,第211页。

⑤《李达文集》第1卷,第212页。

二、从革命到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李达不仅坚持从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出发，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的哲学反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现代化有其独特性，那就是中国现代化是在外力驱迫下开始的，走的是一条“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势力所主导，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却处于被压迫与被奴役的地位。以李达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华民族解放与世界人民解放的内在联系，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将中国现代化由后发外生型转变为后发内生型现代化。因此，中国革命与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主线，二者都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在对二者的反思过程中，毛泽东当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李达的功绩也是不容忽视的。李达从以下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反思。

一方面，李达通过对中国革命的系统反思，把握到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后（即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像俄国那样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李达进一步反思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在《现代社会学》《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书中，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性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考究。

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性指出：“中国社会问题虽亦同为资本主义之产物，然其发生之理由，乃因产业之不得发展，与工业先进国因产业发展过度而发生之社会问题大不相同，此其特性也。”^①同时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劳动者问题、妇女问题与准无产者问题等方面的特性。在该书的后面，李达又专门分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关系，一方面揭示了帝国主义已经使中国成为国际的半殖民地，指出中国近年的革命运动，大多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另一方面揭示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关系，指明了民族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以及未来趋势。

在《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李达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中国产业革命与欧洲产业革命的不同。他认为，大体上说，欧洲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而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产业革命则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国内的。这就使得中国产业革命具有特殊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众所周知，产业革命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因而在这里，李达实质上已经把握到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类型上存在着“后发外生”与“先发内生”的区别，进而分析了阻碍中国产业革命或现代化的主要因素，那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买办资本主义。因此，“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②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李达进一步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问题进行了总结：“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③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具有双重性质，它是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统一，其未来的趋势必然与世界革命的潮流汇合。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科学揭示。

在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社会学大纲》中，李达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列宁阶段，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他在第1版序言中详细说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书的前五篇讨论了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并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不是一般原理之单纯的例证。他再次肯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号召中国人民认清使命，

①李 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495页。

③《李达文集》第1卷，第558页。

团结起来,以求得中国的自由与平等。

在《经济学大纲》一书中,李达提出了广义的经济学思想,主张“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他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不重视中国经济研究的状况提出了尖锐批评:“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从不曾加以研究。这些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①他认为:“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②

此外,李达还对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问题进行了思考,在《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论著中,李达提出并分析了社会革命的三种方式:议会主义、工会运动与直接行动,认为中国只有走直接行动的社会革命之路,才能取得成功。李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上述创造性的探索,实际上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李达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列宁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桥梁与中介。

另一方面,李达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之先河。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后,李达进一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为了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李达著述颇丰,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还原》《劳动者与社会主义》《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等。在这些论著中,李达列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本质特征即主张集体主义、劳动解放、公有制与群众自由;厘清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与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主张按劳分配;明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社会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历史观、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统一,这主要是指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三者的统一。由上可见,李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解答,即生产资料公有,共同生产,按劳分配,共同消费。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理论内容包括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实践内容则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

对于“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李达也做出了创造性的探索。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始成为真正的实践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的李达,在研究、解说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写就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矛盾论〉——革命行动与科学研究的指南》《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论》等论著,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出发,对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进行了透辟的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解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中李达的理论创新。

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一文中,李达科学分析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特殊规律的关系。他首先分析了唯物史观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本内容,诸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决定全部社会生活,阶级斗争与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等。李达接着指出:“但一般规律在各种个别社会形态中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它所表现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因为每个社会形态都具有许多特殊的特征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一般规律在各个社会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和表现的形式要随着具体的条件和特征而有所变更。这种变更并不意味着一般规律作用的消失,这只是说一般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中起着不同的作用。”^③要正确把握一般规律在各个具体社会

①李 达:《经济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②李 达:《经济学大纲》,第18页。

③《李达文集》第4卷,第543~544页。

形态中的作用与表现形式,就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考察那个社会形态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历史条件和特点。李达批评了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割裂开来,将其中之一绝对化的观点。他认为,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是辩证统一的,但不能否认特殊规律的存在,应将特殊规律看作是一般规律的表现形式。他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说:“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那些一般规律也是起作用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特殊的规律。”^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产生与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一般规律的作用显著不同。它摆脱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盲目性与自发性,为人们所自觉运用。李达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对特殊规律的强调,为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中,李达联系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共同规律,系统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李达认为,虽然一切民族都要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但“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发展是极其复杂的矛盾的与不平衡的过程。某一民族的历史前进运动的方向是否符合于人类历史整个前进运动的基本方向,除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一般规律外,也还有其决定这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②。因此,考察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必须联系它的特殊条件,包括它所处的一定历史阶段,内外部条件,以及受其他民族历史的影响等方面。由此出发,李达论证了不同的民族由于特殊条件不同,特别是先进阶段的民族在与落后阶段的民族交往时,会使后者产生跨越式发展,由此,李达重申并发展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在论文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各国所走过的道路”中,李达详细阐明了苏联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他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有自己的特殊条件,也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苏联的方法,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成功地完成了对工业、农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最后,在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共同规律后,李达强调指出:“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的结合,可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结合。”^③如果忽视民族特点,就会脱离生活与群众,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如果片面夸大民族特点,脱离马列主义揭示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共同规律,同样会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前者是教条主义,后者是修正主义。

三、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李达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创造性探索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他在理论探索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方法论,如宏伟深邃的世界历史眼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与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说,李达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这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一是李达坚持将普遍与特殊统一起来的世界历史眼光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李达从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分析。他强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要以革命手段实现民族之独立,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李达为中国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转为“后发内生型”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今天,全球化正向纵深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紧密。但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改变,新老殖民主义依然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占主导,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更加要求当代中国人民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出发,在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应更加注意维护政治上的独

①《李达文集》第4卷,第548页。

②《李达文集》第4卷,第551页。

③《李达文集》第4卷,第563页。

立,经济上的自主权与民族文化的应有地位。

二是李达在理论探索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过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力争系统全面而准确地诠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深入,对马克思主义介绍之系统全面与准确,在当时的理论界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如今,学界公认李达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部专著——《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与《唯物辩证法大纲》分别代表了三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准。李达在理论界敢于反对各种假社会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敢于反对林副主席的“顶峰论”,敢于批判毛主席的主观能动性无限论,即便被打成“三家帮”受难而死也不改变,这与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追求真理的理论品格是分不开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任务,李达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理论品格,就显得格外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当代中国人民前进的理论武器,更应具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做到既坚持又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首席科学”。

三是李达敢于创新的精神,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完全一致。李达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创新性的成果。这在本文前面已经有所分析。李达从不迷信书本,始终反对教条主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敢于否定自己的精神深表赞同,他自己也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的。他的三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每一部都显示出比前一部的创新。今天,创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各种关于创新的命题层出不穷。但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创新应内化到人们的精神深处,成为行动之指南,而不是仅仅挂在嘴上。李达的创新精神,是内在于他的理论活动中的。但他的创新不是没有前提的,那就是始终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在艰苦吃透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高的。可以说,李达也为当代中国理论界实现理论创新树立了一个典范。

以上三个方面,形成了李达创造性探索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对我们今天从事理论创造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从实践层面上说,李达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创造性探索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李达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对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启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于消除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实现群众的自由。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而且他还在一系列论著中分析了世界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对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注民生,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拉大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另一方面,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李达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既要受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同时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强调要利用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中国自身的特殊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注重自身特点,坚持科学发展是有极强的启示意义的。

李达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及其成果,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这种探索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李达的部分论著发表后很快被译为外文并成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表明他也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这个角度而言,李达也以自己的理论创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

●作者简介:赵士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葛彬超,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9ZX012)

●责任编辑:涂文迁